

略论儒家天人性命之学与释、道思想的历史关联

李丕洋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儒家自先秦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是“天人性命之学”的滥觞。两汉之后,儒学发生了异化,这套“天人性命之学”渐渐被世人所淡忘,而佛、道二教却广为传播,长足发展,它们所发现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的思想成果,既刺激了儒家学者,又为儒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儒家学者借“他山之石”,重新发掘儒家固有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使之发展成熟,蔚为大观。由此可见,文化思想的多元交融对于社会文明的前进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生命智慧;心性哲学;佛道思想;宋明理学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3-0047-07

On the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 Nature

LI Piy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 school has developed a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 nature since the Pre - Qin Dynasty. Confucianism began to dissimilate ,however ,after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 nature faded away. Instead ,Buddhism and Taoism flourished and prospered. Their find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law and human nature stimulated Confucian scholars and provided mental nutrition for Confucianism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ise of the heart - mind theory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Confucian scholars borrowed in return ,concepts from other schools. They excavated ,developed and brought the philosophy of wisdom of life and mind - nature ,which was innate in Confucianism itself ,to maturity and bloom. It shows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fusion of thoughts can accelerate the advance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wisdom of life; philosophy of mind - nature; Buddhism and Taoism; heart - mind theor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思想体系儒、释、道,是一群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思想伙伴”,正是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灿烂与辉煌。本文拟从儒家天人性命之学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谈一谈释、道思想对儒学的积极影响与促成作用,以揭示文化多元性的意义与价值。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形态。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有心性哲学、义

收稿日期:2012-03-10

作者简介:李丕洋(1971-),男,山东省昌邑市人,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理哲学、还有经学、实学等等。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儒学所倡导的伦理纲常和治国平天下的有关学问,的确是释、道二家所没有的。但是,儒学数千年间所弘扬的天人性命之学(用现代汉语勉强可译成“心性哲学”或“生命哲学”)因为其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本身,因而就有了与释、道二家相衔接的可能。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儒、释、道三家相互砥砺、相与激荡,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心性哲学与生命智慧。

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哲学的后期形态——宋明理学,完全是暗中搬用了释、道思想,才构成了自己的生命与心性哲学体系。以笔者多年研究的思想心得,发现这种观点其实是由粗枝大叶的学风所导致的浅陋之见。如果我们深入到历史文献中去用心发掘,就会发现,儒家天人性命之学的产生时间甚早,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对生命和人类心灵的独到理解。

一、先秦儒家天人性命之学的思想内蕴

在儒学的基本经典《中庸》的开篇,作者就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赋予、规定之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上天赋予人类的那个先天原本的心体就是性;人们遵循这个天命之性去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就叫做道;按照这一道的原则去修行、践履就叫做教,亦即儒家教育的根本宗旨。《中庸》的作者一般被认为是子思,本文亦从其说。子思与其再传门人孟子一起,构成了先秦儒家天人性命之学的基本流派——思孟学派。孟子接着子思的思想往下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可以说,孟子的这段话,和子思在《中庸》的开篇语一起,构成了一段简练而完整的儒家生命与心性哲学的思想。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诠释,其主旨如下:作为万物的灵长,人与一般动物的关键区别不在于肉体,而在于人的心灵。上天赋予了人类一颗独特的心灵,它富有智慧,先天地具有道德感悟能力。人类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住这颗本心(即“性体”),那么就能够顺道而行,完成应尽的人生使命,走好自己的人生历程,圣人立教,也就是为了让人任用这颗至善的本心。可惜的是,许多人在后天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迷失了这颗本心,因而产生了种种思想烦恼和生命的困顿。那么,人怎样才能找回这颗本心呢?孟子指明的路径是:用存心养性的功夫去做,无论生活坎坷与否,无论生命寿夭与否,坚定地走下去,最终会有“尽心知性”的结果,那时,人也就通过自己,认识到了在自我身心中所蕴藏的“天”的真正内涵。

“天命之谓性”和“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根本理念的典型表达。客观地讲,从现代科学体系中是不会诞生出这样的生命理念的,因为现代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分、分门别类的研究模式,只能得到某一事物或领域的具体知识和相对真理,要想获得对宇宙和生命的彻悟,只有在“天人合一”状态下才能达到,而古代的儒、释、道哲学,在这一点上,一开始就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性,这也算是东方文明的特殊之处吧。

领悟了“天命之谓性”的基本理念,对儒家生命哲学而言,算是“明体”,自古以来,有其体必有其用。觉悟本心(或曰“性体”)之后,自然会伴随着产生相应的生命感受,这就是后来为宋儒所津津乐道的“孔颜真乐”(或曰“孔颜乐处”)。

在《论语》中,记载了孔子称赞其徒颜回和自况的两段文字——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白)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翻翻史籍就可以知道,孔子的一生,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成功者。他周游列国,漂泊十四载,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孔子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愤世嫉俗、郁郁不乐的人。相反,他即使在吃粗粮、喝白水、弯起胳膊肘当枕头这样的简单生活中,都能够保持一份“乐”的生命体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体验,那种通过不义的手段得来的富贵,与这种恬淡自如的“真乐”相比,只能像浮云一样飘飘

飘。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最能体验到与孔子一样的生命境界的,只有颜回一人,他家境贫寒,过的是“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换了一般人,简直不堪其忧,可是,颜回因为有此“真乐”在胸,并不在意生活的贫困,而是整天乐呵呵的,达到了“不改其乐”的境界。

这里需要指出,所谓“孔颜真乐”,并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外在的利益而喜笑颜开,也不是整天自我放纵、寻欢作乐。明儒王一庵指出,孔颜乐处即是“天性中自在平和之真体”,又说“孔颜周程之乐,都只无声无臭,今日用间但觉忻忻融融,无忧郁烦恼处,即是乐也。”^{[1][P163]} 如果再用今天的话语来阐释,所谓孔颜真乐,就是在觉悟了先天原本的心性本体之后,必然伴生的一种自如无碍、愉悦和畅的持久性的心灵体验,亦即精神的自由境界。在这里,觉悟心性仿佛如同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认识和掌握必然规律,而自由无碍、愉悦和畅等精神感受则标志着主体的心灵对现实中各种内外束缚的超越与解脱。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明白孔子为什么不知疲倦地像“木铎”一样在天下推广宣传他的人生理念和政治主张,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屡次遭受挫败之后,孔子依然能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了。

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有了关于生命与心性哲学的精深修养和理论体系,只是语焉不详,十分简要。儒家在孔子身后分化为多个学派,继承了孔子的生命与心性哲学思想精髓的只有思孟学派。到了汉代,当董仲舒为儒家赢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待遇之后,儒家登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宝座,可是,儒学从此也就发生了异化。在两汉,儒学以官方哲学的身份一变而成经学,自身内部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大讲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考订和文字训诂,前者失于荒诞而后者失于繁琐。就这样,在儒家哲学中,尽管名师辈出,著作浩繁,可是,能够体现先秦圣者生命智慧的天人性命之学,却渐渐地湮没了。两汉四百年间,如果有人想获得关于生命和心性的智慧,往往习惯于到道家而非儒家经典中去寻找,儒家的生命与心性哲学被章句训诂式的儒学所遮掩,人们渐渐淡忘了儒家思想中还有关于生命与心灵的深邃见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千余年,直至北宋时期才得到改变。在此期间,关于生命与心性智慧的学问,几乎完全被佛、道哲学所取代。

二、佛、道二教性命之学的思想启示

《周易》中说“天下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系辞下》第五章)产生时间并不晚于先秦儒学的佛、道二家,对于生命的底蕴和心灵的奥秘,自然也有过深入的探索,并得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东汉政权瓦解之后,失去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支持,儒学从圣坛上倒下,一度黯然失色。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起僵化保守的儒学来,佛、道思想更能够满足人们解脱苦难、向往自由的精神需要。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多年间,是佛、道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组织和思想准备,进入盛唐之后,率先迎来鼎盛局面的,不是儒学,而是佛、道二教。佛、道二教关于生命和心性哲学的深邃的理论成就,成为以后儒家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振兴的思想阶梯。

首先来看佛教哲学。这个来自古印度的宗教,以度化众生超越六道轮回,出离生死苦海为目标,以涅槃成佛为最终正果。所谓佛,很多人以为是与造物主相同的一个范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佛的原本含义是觉悟了真理的人,或者说是因为觉悟真理而解脱生死束缚的自由人。只是进入像法时代之后,人们才开始塑造宏大壮观的佛像加以顶礼膜拜,渐渐地,人们便把“佛”等同于神灵或造物主,这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宗教观念的滑稽产物。为了成佛,就必然要有相应的修行方法,释迦牟尼时代的原始佛教,提出了有名的“四谛八正道”修行论。四谛即是苦、集、灭、道,八正道则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人把这八正道又归结为戒、定、慧三学。戒即持戒,即用一套方式来守护自己的心灵,使之不受内外诸物的污染;定即禅定,这是沿袭了古代印度各宗教都使用的一种具体的修行方法,通过坐禅入定,使人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静定之中体会到真如佛性的本来面目;慧即用佛陀所传授的智慧去洞察世间的一切,达到超尘拔俗的境界,既懂得“缘起性空”的道

理,从而放下一切俗缘;又洞察“因果不空”的实谛,从而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佛教在中国流传了五、六百年之后,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交融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禅宗,等等。每个佛教宗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具特色地阐述了自己对佛教哲学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在阐述各自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和发现。特别是盛唐时期形成的禅宗思想,比起别的佛教宗派来,迷信色彩最少甚至全无,完全以透彻的体悟和深邃的见地来征服信徒。禅宗的基本宗旨被归纳为“不立文字,口授心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这里,通过自心体悟“真如佛性”的修道路径,已经具备了与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哲学相互对接的充分可能性。而且,禅宗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如青天,只是被众生的无明妄念和执着之心所构成的浮云所遮蔽,只要以般若慧风扫去妄念浮云,那么,人的天性本心自然显露无余,修道者也就因此而证得了真如。从这个角度讲,佛教哲学的修道理念也可以用“复性”二字来概括,是对人类生命的本真状态的追索和体悟。正因为佛教哲学中有这些殊途同归的思想见解,因此,后来便成为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一系)重构生命与心性哲学时积极吸纳的思想源泉。

其次,道教哲学同样是对人类生命和心性奥秘深入探索的思想成果。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是道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来源。老庄哲学内涵丰富,但是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超越尘俗的生命哲学。老子以“致虚极,守静笃”的方式,体悟到了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本原——“道”,它进行着一个“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从而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宇宙万物,也包括了人类生命本身。老子认为,只有清静无为,才能长生久视。到司马迁所处的汉代,老子已经被神化为活了一百六十余岁的神仙人物。后来道教把他尊为太上老君,不是没有原因的,最起码,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充满着生命哲学的玄奥智慧。被道教后来誉为南华真人的庄子,其实也是一位进行深邃的生命哲学家。《庄子》首篇就叫《逍遥游》,体现了古人对绝对自由境界的真诚向往。在庄子的眼中,御风而行的列子和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鸟都算不上高境界,因为他们对外还有依赖。庄子以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2][17]}这里的至人、神人和圣人,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把他们的共同特性聚合在一块,可以简洁地叫做“古之真人”,这是庄子最为崇拜的理想人格。庄子以为,“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又说“古之真人,不知说(通‘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拒;儻然而往,儻然而来而已矣。”^{[3][189]}总之,真人是一种完全处于自然状态的、心地纯粹的人,达到了天地万物“与我为一”的生命境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有过思想冲突。但是,作为人类生命智慧结晶的两大产物,“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是一件自然而又必然的事情。佛、道两家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互相吸取对方的理论长处和经验方法,渐渐地,到了唐代,佛、道两家的融合已经十分明显。例如: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647—735年)在其名篇《坐忘论》中阐述修道的基本方法时说“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4][168]}这段话中所讲的修道方法,既适用于道教,又适用于佛教,可以说是两教合流的思想产物。到了宋明时代,佛、道两家的合流更加明显,以至于有人将修道的正果表述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三界”的说法来自于佛教,是指无色界,色界和欲界,成佛之人,就是超越了“三界”局限性的纯粹自由的生命体。“五行”是中国本土的说法,即阴阳五行的后天宇宙。道教一直秉承这样一种理念,即修道者应当超越五行的局限,“复归于无极”。无论是佛教的“跳出三界外”,还是道教的“不在五行中”,其实质是名异而实同,指的都是超越了凡人的生命状态,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同于大道的先天本真状态。

三、宋明理学对于天人性命之学的重建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融合,以及它们在探索宇宙和生命的深层奥秘上的卓越成就,必然引起儒家士

人的关注和自省。为什么佛教和道教能够长久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号称圣学的儒家思想,在魏晋之后一直处于中衰的状态?到了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重文抑武和优待士人的开明政策,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幸运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这些儒家士人,不仅可以公开地继承先秦孔孟之道,还可以从容地在佛、道二教的思想宝库中浏览、选择。于是,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为代表的一批儒门学者,“出入佛老,返诸六经”,^{[5] (P638)}在细致的比较、选择中,他们终于突破了儒家自汉唐以来一直流传的章句训诂之学,重新构建起新的儒学体系。除了为儒家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提供更新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依据外,这些儒家人士还深入研究了先秦儒家固有的天人性命之学,重新发掘出孔、颜、思、孟的生命智慧和心性哲学,在借助于某些佛、道话语方式的基础上,再次振兴了儒家的生命与心性哲学思想,把热爱探索生命与心灵奥秘的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儒家圣学的范畴中来。仅以周敦颐为例,周敦颐年轻时,勤勉好学,不仅熟读儒家经典,而且喜欢与佛、道中的人士往来。据传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陈抟老祖,曾作《无极图》,并将图传授给种放,种放又传给穆修,穆修又传给周敦颐。周敦颐在《无极图》基础之上,改画成《太极图》,并据之而作《太极图说》。文章只有短短249个字,但是,却将一套综合儒、道观念的宇宙生成论和生命本体论清晰扼要地阐发出来。他提出了“无极→太极→二气五行→生命诞生”的演化过程,不仅综合了此前中国古代的宇宙和生命观,而且成为宋明理学世界观的基本模式。除了积极吸取道家的思想营养之外,周敦颐还和佛教禅宗高僧有着密切的思想交流。史载:

元公初与东林總游,久之无所入。總教之静坐,月余,忽有得,以诗呈之曰“书堂兀坐万事休,日暖风和草自幽。谁道二千年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總肯之,即与结青松社。游定夫有周茂叔穷禅客之语。^{[6] (P524)}

除了东林常聪(即东林總),周敦颐还和鹤林寺僧寿涯等人来往密切。寿涯的名偈“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对于周敦颐形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同样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然,周敦颐早年积极地向佛、道高人学习,并没有使自己的学术变成“四不像”,而是以一种“坐集千古之智”的思想高度,重建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如果认真读一下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等著作,就会发现,他的思想仍然以儒家为本位,只不过变得更加博大精深而已。

在整个宋明理学时代,除了“北宋五子”的开端作用之外,陆王心学体系中的许多大家(如王阳明、王龙溪、王畿等人)对于阐发儒门圣学所固有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克服时人对佛、道思想弊端的模糊认识,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般的关键作用。以王阳明(1472—1529年)为例,他早年曾经醉心于佛、道功夫的修炼,为寻访道家异人,不惜攀崖历险,到达九华山深处;在故乡会稽山阳明洞,他结庐修炼,出现了前知功能;在杭州西湖,他以深湛的禅修功夫,劝化了坐关三年的禅宗高僧。可是,禅、道功夫的获得并没有解决王阳明的生命困顿,一直到龙场悟道之后,他才豁然开朗,终于回到儒家的思想本位上来。后来,他回顾这段历程说:

“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7] (P36)}

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此时的道行境界,绝非那些只会以正统自居、固步自封的俗儒可比。他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是吸纳、借鉴了佛、道思想精华的高度综合的产物,自始至终,他对佛、道生命哲学的态度都是开放性的。这一点从他晚年与弟子的一段对话中可以充分体现——

张元冲在舟中问“二氏与圣人之学所差毫厘,谓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今观二氏作用,亦有功于吾身者,不知亦须兼取否?”先生曰“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已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

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7] [P1289]}

王阳明的这段话,以“二氏之用,皆我之用”的开放和包容胸怀,体现了一位探索生命奥秘的得道者的睿智思想。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没有佛、道思想的充分发展和广泛传播,王阳明再有天赋,也不可能达到对儒家生命智慧和心性哲学的透彻领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其实十分有助于产生新思想、新事物,而单一的文化思想,表面看起来可能高大宏伟,实际上,必然渐渐窒息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将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带入停滞不前的泥淖。由于王阳明精通三教之智慧,因此在教育弟子的过程中,不拘一格,灵活变通,因而达到官方程朱理学所望尘莫及的绝佳效果。他的有些关于生命智慧和心性哲学的思想至今耐人寻味。仅以他的两首诗词为例——

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仙。(《答人问道》)^{[7] [P791]}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握手临歧更可语?殷勤莫愧别离筵。(《别诸生》)^{[7] [P791]}

“饥来吃饭倦来眠”一句,源出唐代禅僧大珠慧海之口,据记载: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8] [P157]}律师杜口。

在此,王阳明与禅宗高僧和道教思想都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即认为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存在着生命的先天本真和自由境界,就看你是否体会得到。“饥来吃饭倦来眠”一句,和“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一句,将儒、释、道关于生命智慧和修道哲学的共同认识融为一体,把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距离拉到了最短。这种透彻、通达的生命智慧,就是佛、道中任何一位高士都不能不叹为观止。

王阳明开创的明代心学运动,实际上是儒家天人性命之学思想的重振,并且使之发展到了成熟阶段。除了王阳明本人,他的许多门徒以及再传弟子的心性功夫,都达到了“证悟”乃至“彻悟”的水平。因为身在儒家的缘故,他们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中,克服了佛、道所不可避免的荒诞和迷信糟粕,但是将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天人性命之学的真知却充分地吸取,因此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将先圣孔孟的生命和心性哲学思想阐发得更加清楚。例如,泰州学派的传人王襞(1511—1587年),是王阳明的著名弟子王良的儿子,也曾经亲炙于王阳明、钱德洪和王龙溪等大儒。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秋季,他到南京游历讲学,风动儒林,“一时同志闻其超诣自得之学,皆克然若有悟也”。在此期间,王襞特意向留都士人讲解了“孔颜乐处”的真谛。史载:

东厓子之始至而论学也。有问“学何以乎?”曰“乐。”再问之,则曰“乐者,心之本体也。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然则必如何而乐乎?”曰“本体未尝不乐,今日必如何而后能是,欲有加于本体之外也。”“然则遂无事于学乎?”曰“何为其然也。莫非学也,而皆所以求此乐也。乐者,乐此学;学者,学此乐。吾先子盖尝言之也。”“如是则乐,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后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者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可也。”“既无所倚,则乐者果何物乎?(抑)道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也,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也,所乐者心也,是床上之床也。”^{[9] [P674]}

这段对话,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自如之乐,它不需要依赖于外在事物就可以独立自在,又可称“无物之乐”,与世俗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快乐相比,它是人心中真正堪称宝贵的“真乐”。这种真乐,实质上就是人类心灵先天原本的状态(即“心之本体”),是上天赋予人类生命的灵性和妙用所在,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上》)孔子、颜回

不受生活境遇束缚而始终保持的那份快乐,就是这种先天本心的自然流露。早在北宋时期,程颢和程颐兄弟俩青少年时曾就学于周敦颐,周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0] [P66]}一年后,二人略有所得,“吟风弄月以归”,^{[10] [P112]}后来继续深造,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宗师。此后,达到这种体悟水平的大儒代不乏人,直至王襞出世,扛鼎泰州学派之时,便将孔孟哲学中最有思想魅力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的内蕴阐发得一览无余。

综上所述,儒家自先秦开始,就有一套自己关于生命与心性的独特思想,其实质,就是后来宋明理学所关注的“天人性命之学”的滥觞。不过,两汉之后直至唐末,由于儒学在升为官方哲学之后发生了异化,这套深刻的“天人性命之学”被世人所淡忘。与此同时,佛、道思想却广为传播,大放光彩,它们所发现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的思想成果,既刺激了儒家学者,又为儒学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有益思想资料。到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由“北宋五子”发端,借他山之石,重新发掘和弘扬儒家固有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直至明代心学盛行之后,儒家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这块“璞玉”,终于雕刻成型,蔚为大观。由此可见,文化思想的多元交融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和创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历史上那些为探索宇宙和生命奥秘而坚忍前行的修道者的崇高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

参考文献:

- [1]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卷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2]曹础基注译.庄子浅注·逍遥游\[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庄子浅注·大宗师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中国宗教名著导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5]二程集(明道先生行状)\[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宋元学案(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王阳明全集(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8]五灯会元(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新镌东匡王先生遗集二卷\[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6\[M\].济南:齐鲁出版社,1997.
- [10]二程遗书(卷二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余小江)